

[首页 \(/\)](#) > [文章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71\)](#) > [学术探索 \(/index.php?m=home&c=List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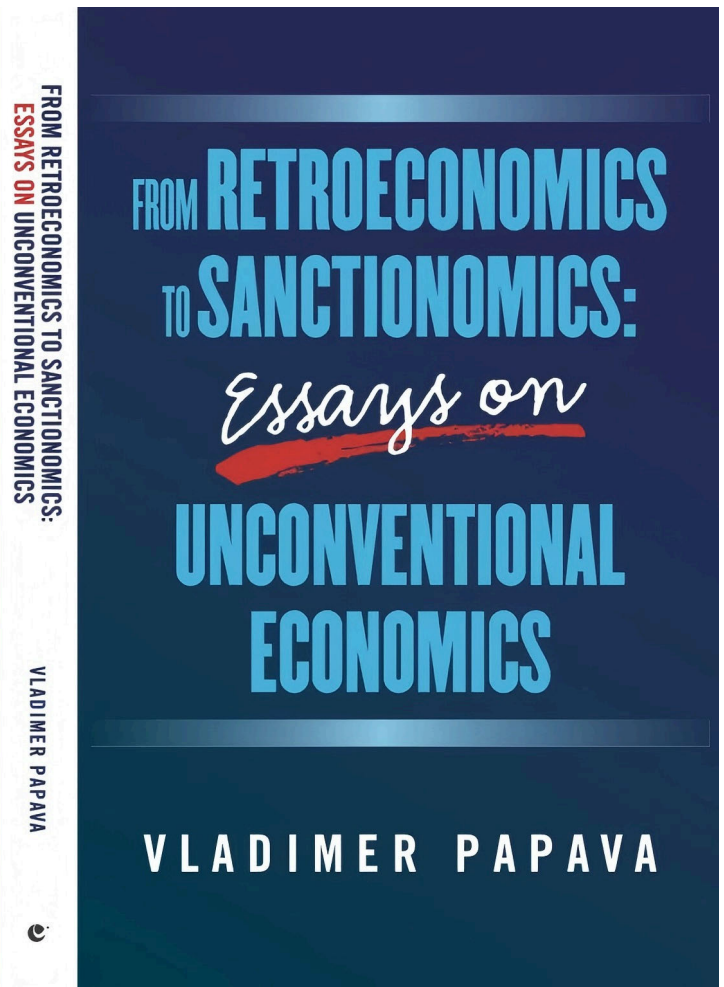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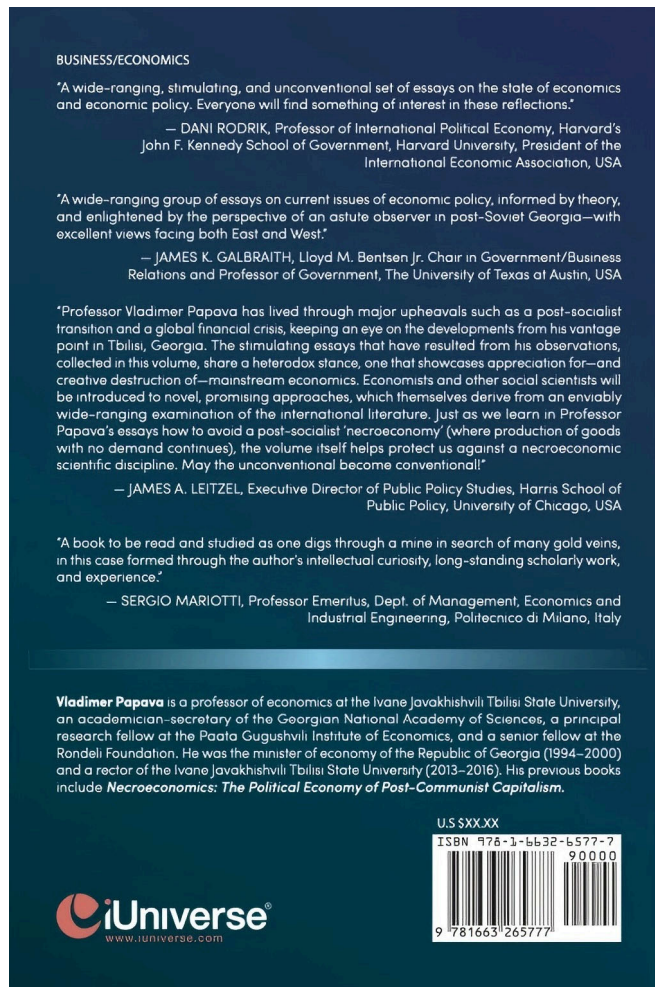
【成员作品】《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十二）

2025-04-29

书籍介绍

我们很高兴代表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员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mier Papava）教授向大家翻译及分享他的最新学术著作《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本书是一本探讨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的限制，聚焦于那些非平凡且极具争议的议题。书中不仅为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辩护，还提出了诸多克服危机的创新性建议。



第一部分：导论文章：非常规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120&idx=2&sn=a321928eb5e7e156083e8d54700a1124&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二部分：论经济危机及克服危机的一些方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147&idx=2&sn=8e426e71e7a5ea3d636f274c303afb5e&scene=21#wechat_redirect) ESSAY 1
第三部分：论生产要素理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147&idx=2&sn=8e426e71e7a5ea3d636f274c303afb5e&scene=21#wechat_redirect) ESSAY 2
第四部分：ESSAY 3 论市场平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283&idx=1&sn=3112e42901d962b1b950aff19052a2d7&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五部分：ESSAY 4 论死亡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343&idx=2&sn=485b33d75dfc66572acbc348740ab0b9&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六部分：ESSAY 5：论全球金融危机，或“死亡经济学”与“僵尸经济学”的融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449&idx=2&sn=6c76820ae74a5f1c18a87a9f0136abcb&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七部分：ESSAY 6 论逆向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568&idx=2&sn=a41717339fe97fef51b60a86b222e364&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八部分：ESSAY 7 论追赶效应（全球主要国家危机后经济增长的案例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712&idx=2&sn=7476fb68d1dff6cf76bbe0424183310&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九部分：ESSAY 8 追赶与追赶效应：后共产主义欧洲的经济增长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747&idx=2&sn=0ee072f119d861ef8dcbff846736f8df&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十部分：ESSAY 9 修正通胀指标与复合通胀目标制（与 Vakhtang Charaia 合著）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845&idx=2&sn=c6bc56e8d5ef4189d2ceba8c55908031&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十一部分：ESSAY 10 关于拉弗效应、拉弗曲线及其对后共产主义经济的修正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889&idx=2&sn=a95b980193274987ab2fb76cf48acd6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SSAY 11

Coronomics, the Coronomic Crisis, Underproduction Inflation, and the Zombification of the Economy*

With Mikheil Chkuaseli[®]

11.1 Introduction

Both 2020 and 2021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year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Ghebreyesus 2020), which triggered a new global economic crisis (e.g., Baldwin, di Mauro, eds. 2020; Madi et al. eds. 2024). In other words, humanity was experienc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at the same time (Grigoryev 2020).

The economic crisis was caused by the impact of severe restrictions on social contacts in response to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as a result, many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ere forced to suspend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e.g., Geller et al. 2020).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economy, or rather, on the economic crisis, a new term, “coronomics,” was invented. It was coined by combining the terms “corona” and “economics” and denotes a subsector of economics that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 Essay 11 is based on Papava (2020a, 2020b, 2020d, 2022) and Papava, Chkuaseli (2021).

ESSAY 11

经济学、经济学危机、生产不足通货膨胀和经济僵尸化（与 Mikheil Chkuaseli 合著）

11.1 引言

2020年与2021年必将作为COVID-19大流行纪元载入史册（Ghebreyesus 2020），这场疫情引发了一场全新的全球经济危机（如Baldwin与di Mauro主编 2020；Madi等主编 2024）。换言之，人类同时承受着冠状病毒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双重冲击（Grigoryev 2020）。

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为遏制病毒快速传播而采取的严格社交限制措施，迫使众多经济部门暂停经营活动（如Geller等 2020）。

为描述COVID-19大流行对经济（更准确说是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学界创造了新术语“coronomics”（新冠经济学）。该词由“corona”（冠状病毒）与“economics”（经济学）复合而成，特指研究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经济影响的细分经济学领域（de Alwis 2020）。此后又衍生出类似术语“coronanomics”（Eichengreen 2020）。基于这些术语，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被称为“coronomic crisis”（新冠经济危机）（Papava 2020a）。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危机并非经济领域（或其管理）决策失误所致，其终结也不取决于经济学家制定的危机应对措施。只有通过有效的疾病治疗与疫苗接种终结COVID-19大流行，才能真正克服新冠经济危机。不过，该危机的某些层面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如Basu 2020；Hamada 2020；Papava 2020d）。

若新冠经济危机的终结取决于医学界抗击COVID-19大流行的成效，则可断言：在此次危机中，经济已成为医学的“人质”（Papava 2020a）。

根据抗疫经验及反危机措施的制定实施过程，各国政府在国际组织支持下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旨在解析政府作为独立生产要素（Papava 1994, 2017a）（参见ESSAY 2）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行动，并揭示新冠经济危机期间财政支持措施可能引发的最严重后果——通过启动和加速经济僵尸化进程。换言之，本文旨在全面探讨政府经济能力对新冠经济危机的影响机制，这种影响最终将助推经济的僵尸化（Papava, Chkuaseli 2021）。

11.2 新冠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如引言所述（参见11.1），COVID-19大流行期间，整体经济（特别是危机出路）完全受制于医学发展。此外，新冠经济危机的爆发源于医学界无法通过除暂时关闭经济部门外的其他手段遏制病毒传播。因此，这场危机的经济诱因具有外生性而非内生性（Papava 2020a）。

根据过去数十年（尤其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积累的危机应对经验，经济学家与医学专家曾主要研究经济危机对医疗体系（Maresso et al. 2015）、危机期间公众心理健康（WHO 2011）以及传染病传播（Suhrcke et al. 2011）等方面的影响。COVID-19大流行彻底扭转了这一研究范式，经济学家现在需要重点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反作用。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类似非经济内生、而由外部冲击引发的经济危机。这类危机被称为非典型经济危机（atypical economic crises）。典型案例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以及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崩溃引发的危机。其“非典型性”体现为：这些危机既不同于典型经济危机，彼此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战后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军事行动破坏的产物，核心任务是受损建筑与设施的修复乃至重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冠经济危机中所有基础设施完好无损，但大量场所被强制停运。

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是由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与这种非典型的经济危机不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制度基础的转变毫无关系。同时，这种经济危机在世界历史上是众所周知的，是由各种疾病的流行引起的（如Roach 2020b）。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1918年爆发的著名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西班牙流感”）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经验的研究（如Bishop 2020；Maas 2020；Ullman 2020；Van der Veken与De Santis 2020），因为这场危机与现代经济危机有许多共同之处：经济活动减少、生产量下降、居民收入减少等。

然而，这些经济危机是不同的（如 Scheidel 2020）。首先，如果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的，导致了因军事损失而引发的经济危机，那么幸运的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爆发之前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其次，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世界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全球化。供应链和价值链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大多数情况下，供应链和价值链开始瓦解（例如，Derviş, Strauss 2020）。第三，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初，旅游业和国际运输联系还不像二十一世纪那么发达，导致这些经济部门在工程学危机期间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由此可见，新冠经济危机具有非典型性（Papava 2020d）与独特性（Ajili 2020）。

11.3 论生产不足型通胀

新冠经济危机引发了高通胀现象。要解决这一高通胀问题，必须首先理解其根本成因。具体而言，需要明确我们面对的是需求上升、供给下降，还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Sachs 2021）。只有准确识别通胀的真实诱因，才能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Rodrik 2022）。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需求上升与供给下降的复合作用，其中供给端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需求的部分增长源于政府向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直接发放现金补助。但供给下降对通胀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其根源在于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经济部门封锁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如Todo等 2023）。

2021年年中曾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这只是短期供给瓶颈问题（Stiglitz 2021），但到当年秋季，全球生产体系实际崩溃的事实已显而易见（Coyle 2021）。新术语“supply-chaininflation”（供应链通胀）的出现，正反映了供应链中断推高通胀这一现象的重要性（Pride等 2022）。显然，经济部门全球性封锁引发的新冠危机正是供应链通胀的根源（Marin 2021）。

全球供应链断裂破坏了国际生产的技术循环，导致产出水平下降。因此从本质上看，供应链通胀是生产不足型通胀（underproduction inflation）的成因之一（Papava 2022）。

由此可见，COVID-19大流行经济危机引发的通胀（Rickards 2022）本质上属于生产不足型通胀。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央行是否有能力解决供应链通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央行缺乏修复旧供应链或建立新供应链以提升产出的政策工具。换言之，供应链通胀问题具有非工具性特征。

央行的根本错误在于未能认清高通胀的经济根源，将其误判为宏观经济问题（Galbraith 2021, 2023a, 2023b）。而如前所述，这实质上是典型的供应链通胀现象。

由于将通胀视为宏观经济问题，央行开始通过加息抑制需求。但此举同时提高了借贷成本，将进一步压制生产活动，最终加剧供给收缩。这种缺乏依据的决策暴露出政策制定者的混乱（Roach 2022）。

供应链通胀的解决完全依赖于建立运转良好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这需要基于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背景进行重构（Krugman 2024；Rogoff 2021）。

根据经济效益原则，新建全球供应链必须考量COVID-19大流行风险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与区域性威胁（Inoue与Todo 2023）。部分产业或将转移至生产成本显著上升的国家和地区，这可能导致解决供应链通胀的过程中催生新的通胀——即经济学家所称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运行机制如下：面对生产成本上升，企业为维持利润将提高产品价格。若市场无法消化涨价，企业将退出市场，而产量减少最终仍会推高价格。因此，成本推动型通胀是生产不足型通胀的另一诱因。

这意味着在克服供应链通胀的同时，我们将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生产不足型通胀的一种成因被另一种所替代。

鉴于上述分析，后疫情时代以经济增长、供给扩张和生产率提升为核心经济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Spence 2022）。

11.4 新冠经济危机中政府经济能力的特征

必须强调，政府在克服经济危机及推动危机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如Krugman 2009a；Shiller 2008；Stiglitz 2010）。换言之，在经济危机期间，作为第五生产要素的政府经济能力（economic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成为五大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这很容易理解——该要素一方面组织危机国民经济框架下的生产活动，支持困境企业；另一方面制定并实施反危机措施以终结经济危机。

在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中，政府经济能力的特殊作用完全取决于本次危机的特性。这对于新冠经济危机同样适用：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流行病还是全球范围的大流行都无法被克服，国家更无法走出危机（Stiglitz 2020a）。也就是说，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还是特殊的新冠危机，政府经济能力都在生产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Elion等 1976, 64–66）（Rodrik 2020）。

新冠危机期间，政府经济能力运作的最高优先级是对医疗系统的最大力度支持与发展——没有健全的医疗体系，既无法治疗新冠肺炎也无法阻止其传播。同时，政府经济能力的积极作为是克服新冠危机的必要条件。此外，政府经济能力还需确保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并提高其公众可及性（Stiglitz等 2020）。

在新冠危机背景下，有必要修订政府经济能力中某些立法确立的通行规则。这尤其涉及2020年底启动的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专利与版权机制的使用问题——这些机制实质上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注册疫苗的大规模分发设置了法律障碍（Penteado 2020；Woods 2021）。

暂停专利与版权保护机制，是确保几乎所有国家都能开展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的有效途径（Stiglitz等 2020；Spence等 2021）。换言之，新冠疫苗本应成为公共产品，这符合政府经济能力将新技术认定为公共品以拓展其“边界”的模式，从而从质上扩大经济领域技术突破的可能性（Sachs 2017a, 91）。

需注意的是，即使拥有足量的优质新冠疫苗，也不意味着疫苗接种能无障碍推进——这主要与接种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关（Papava 2020c）。因此，政府经济能力的首要任务除了提供足量优质疫苗外，还包括最小化所有接种风险并提高公众认知。

就COVID-19大流行而言，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是“全球化的代价”（Auzan 2020）。但这场全球大流行伴随着被视作逆全球化开端的进程——早在疫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如Sachs 2017b）和英国脱欧（如O'Rourke 2019）就已推动这一趋势。

COVID-19大流行可能引发的逆全球化进程，因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主要是WHO）为代表的政府经济能力对病毒快速失控传播准备不足而加速。这迫使各国政府自行承担风险采取防疫措施。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迫使政府经济能力暂停旅游业和客运等业务，加之先前所述国际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断，这些现象——以及各国政府防疫措施的不协调，更不用说疫情初期WHO等国际组织的混乱——被解读为“全球化危机”的开端，向孤立主义及政府经济能力孤立化的转变。而孤立主义不仅对经济增长（Rogoff 2020）产生负面影响，还波及社会、政治和环境领域（Haass 2020）。

鉴于疫情具有全球性，孤立主义无论是对于抗疫（Stiglitz 2020a）还是疫后经济发展（Åslund 2020；Fung 2020）都是死胡同。通过政府经济能力在国民经济局部层面实施全球范围的最大限度协调，才能成功抗击COVID-19大流行（Mazzucato与Torreele 2020）。

新冠危机期间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经验也凸显了全球化的“益处”。这些技术拯救了教育、贸易等部门，使其不仅没有停摆，反而基于技术实现了业务转型。同时，疫情暴露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网络连接水平上的差距（Passaris 2021）。鉴于疫情的全球性，只有全球协作才能克服危机。

由此可见，政府经济能力的逆全球化进程只是暂时的。同时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不应虚度光阴，而应充分利用当前形势及时采取措施，为真正即将到来的政府经济能力全球化新浪潮（包括更高质量的全球化水平）做好准备（El-Erian 2020）。

COVID-19大流行的经验使防范经济安全风险成为明确优先事项。其中粮食安全最大化相关的风险尤为突出（Blair与Kalibata 2020）。在政府经济能力面临的挑战中，与经济安全相关的议题具有特殊重要性，并可能新的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存在。

从理论上讲，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出现引发新疫情的新病毒，而COVID-19期间积累的经验将无比珍贵。因此，基于这些经验，政府经济能力、企业能力乃至全人类都需要学会在疫情中生存与行动（Gigerenzer 2020）。这直接表明，对于政府经济能力和企业能力等生产要素，有必要吸取所谓“疫情行为”的经验，以应对未来疫情中可能出现的新的经济约束。

11.5 论COVID-19大流行期间反危机措施的本质

前文已指出，将新冠经济危机与典型经济危机（包括2008-2009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进行任何类比都极其肤浅（Roach 2020a）。尽管如此应当承认，自新冠危机爆发以来，政府经济能力运用的经济工具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对成功使用的工具并无二致（Hatheway 2020）。

从理论视角看，1929-1939年大萧条后几乎所有经济危机都明确显示出回归凯恩斯主义经典理论的必要性。毫不意外，这一方法在新冠危机期间完全保持其适用性（Skidelsky 2021；Velasco 2020）。

但典型经济危机与新冠危机的反危机措施存在根本差异。典型经济危机中的措施旨在实现双重功能：保障民生与企业生存，以及推动经济走出危机。而新冠危机的终结完全取决于能否战胜疫情——这如前所述属于医学领域的直接任务。因此反危机措施仅剩单一功能：维持民众生活与企业存续。

基于政府经济能力在新冠危机中采取的经济措施特性，可将其分为两类：作为“生存措施”的反危机手段，以及作为经济“复苏措施”的疫后方案。后者应当先于必要的疫后经济改革实施（Skidelsky 2021）。

各类经济扶持计划的有效性属于专门研究课题（如Jiang等 2020；Zaitsev 2020）。政府经济能力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包含三大目标（IMF 2021）：

1. 为新冠病毒预防（接种）与治疗提供医疗系统的资金支持与发展；
2. 对受新冠危机影响的弱势群体实施财政援助；
3. 对因新冠危机部分或完全停运的企业采取金融扶持措施。

这三个目标方向完全符合政府经济能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定位。具体而言：没有医疗系统的资金支持，就不可能终结大流行和新冠危机；对弱势群体的财政援助既是人道主义要求，也是为疫后时期保留合格劳动力的经济考量；企业金融支持则是为了确保其能继续存在于疫后市场。

上述保障民生与企业的反危机措施通过刺激需求加剧了通胀，与生产不足型通胀形成“伴生”关系（Eichengreen 2024）。

显然，政府经济能力采取的这些反危机措施本质上是增加国家预算对特定目标的财政支出。但各国预算支出增长的同时，因企业部分或完全停运导致税收减少。其结果是财政赤字持续扩大，迫使政府经济能力不得不增加借贷。由此直接导致新冠危机期间（Gros 2021；IMF 2022）及后疫情时期，全球性的公债偿付问题将日益紧迫（Charaia与Papava 2021；Gaspar等 2023；Lee 2021；Rajan 2020；Spence与Leipziger 2020；Stiglitz与Rashid 2020）。需要强调的是，该问题在新冠危机前就已存在（如Abbas等主编 2019；Dalio 2018；Hager 2016；Newman 2013），不过本次危机加剧了其严重性与紧迫性。此处需特别注意名义利率与名义GDP增长率（实际增长加通胀）的比值关系——保持名义利率水平低于名义GDP增长率至关重要（Galbraith 2023c）。

新冠危机期间，对后疫情时代的前瞻性研究自然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如Gardini主编 2020；Harrington 2021；Kolodko 2020；Madi等主编 2024；Papava 2020c；Skidelsky 2021；Zakaria 2020）。

在企业金融扶持方面，经济僵尸化的现实威胁已然显现（Stiglitz 2020b）。

11.6 COVID-19大流行期间经济僵尸化

僵尸经济（参见ESSAY 5）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日本（如Hoshi 2006）。具体而言，这种经济形态诞生于金融危机的深渊之中（如Ahearne与Shinada 2005, 368）。

日本僵尸经济现象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演变为全球性现象（Constable与Wright 2011；Desjardins与Emerson 2011；Harman 2010；Onaran 2012；Quiggin 2010）。在此次危机中，多数国家通过“利润私有化与损失国有化”的特殊反危机计划（Mau 2009, 10），为私人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个别企业提供资金支持（Mau 2009, 22-23）。2008-2009年全球危机期间，美国（如Coy 2009；Krugman 2009b）和部分欧盟国家（如Alderman 2010）开始出现经济僵尸化进程，后共产主义国家同样未能幸免（Papava 2009, 2010）。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僵尸化进程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仍在持续（如Andrews等 2017；Banerjee与Hofmann 2018；Blažková与Dvouletý 2020；Krugman 2020；Liang 2017）。

新冠危机期间不出所料地沿用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民生与经济扶持手段。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反危机措施除保障民生与企业外，还旨在终结危机本身；而新冠危机中的同类措施仅具备单一的民生与企业支持功能。走出新冠危机直接取决于COVID-19大流行的终结——这只能通过医学手段防治新冠病毒来实现。

如前所述，日本僵尸经济的经验以及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类似案例表明，困境企业通常能获得直接财政拨款、税收优惠和优惠贷款等支持。新冠危机期间同样使用了这些企业扶持工具。由于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僵尸企业的形成几乎从未中断，新冠危机背景下的此类企业既包括财务健康的“正常”企业，也包括既存的僵尸企业。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对企业的优惠贷款通常会加剧累积的经济问题（如Hazlitt 1988, 2-28）。但僵尸经济的经验显示，许多国家在金融经济危机期间仍会采用这种金融机制。

新冠危机期间，政府经济能力难以准确判断特定企业在危机前的偿付能力。这导致经济僵尸化进程持续加剧（Guerini等 2022；Helmersson等 2021；Papava 2020b；Wrede 2020）。事实上，波音公司、嘉年华集团、达美航空、埃克森美孚和梅西百货等巨头都卷入了僵尸化进程，并可能在疫后时期维持僵尸企业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同某些乐观预测所言——僵尸企业仍能摆脱这种病态症状（Lee与Contiliano 2020）。需要强调的是，即使疫苗接种取得成功，僵尸化进程也可能不可逆转（Donnan 2020）。

前文已强调，经济僵尸化是政府政治利益与政府经济能力冲突的结果——全球经验表明，这种冲突总是以前者的胜利告终。这在“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与Tullock 1962）框架下不难理解：政治决策往往不具备经济理性。

要使政府经济能力在与政治利益的博弈中胜出，必须改变破产立法的基本原则——现行立法旨在避免非意愿破产（如Stiglitz 2001）。破产制度的核心原则应严格确保淘汰（而非保全）缺乏生存能力的企业（参见6.4节及ESSAY 6）（Papava 2017b）。这种立法变革需要政府经济能力的直接“代表者”和“执行者”具备坚定的改革意志。

要使破产立法取得改革突破，必须选择经济非危机期的增长阶段作为最佳时机。在经济危机期间，此类决策既不可行也不恰当，只会加剧政治危机。这一原则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得到印证：当时的破产立法取向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启动破产程序（Boon 2020）。

因此，在疫后经济复苏与改革时期，政府经济能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优先方向之一，是制定并实施旨在克服长期经济僵尸化进程的经济政策。

11.7 结论

COVID-19大流行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特别突显了政府在解决诸多疫情相关问题 and 经济问题中的角色定位。在此背景下，将政府经济能力视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并列的第五大独立生产要素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经济危机赋予政府经济能力特殊的反危机职能。为遏制新冠病毒快速大规模传播，许多国家不得不暂时限制乃至全面暂停大部分经济部门的运行，从而触发经济危机。换言之，COVID-19大流行下的经济危机具有非典型性——其根源并非经济系统内生，而是来自外部冲击。这种外生性决定了本次经济危机的非典型本质，而各类非典型经济危机之间又存在显著差异。

由冠状病毒传播引发的经济危机被称为“新冠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政府经济能力自然成为生产要素中的主导力量。鉴于疫情及其经济危机的全球性特征，各国本应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典型经济危机与新冠危机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并无本质区别。差异在于：典型经济危机措施兼具支持（民生与企业）和终结（危机）双重功能；而新冠危机措施仅具备支持功能——因为危机持续时间完全取决于大流行何时终结。

新冠危机中强化政府经济能力的主要方向包括：优先支持医疗体系建设，为弱势群体和被迫完全/部分停运的企业提供财政援助。实施这些措施必然导致政府预算支出增加。

对企业提供的金融支持助长了僵尸经济现象——该现象最早出现于19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期间。僵尸企业指依靠僵尸银行优惠贷款维持经营的资不抵债企业，这种“双输”操作的“共赢”假象通过政府提供的担保得以维系。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僵尸化进程演变为全球现象，并在危机结束后持续蔓延。新冠危机中的企业金融扶持工具进一步延续了这一进程。令人担忧的是，连行业巨头企业也深陷僵尸化泥潭，且无法保证这些企业在新冠危机后能摆脱僵尸状态。这源于执政党的政治考量——他们担心僵尸企业依法破产会导致选民支持率下降，进而危及自身政治生命。

僵尸经济的本质是政府政治利益与政府经济能力之间的冲突。根据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这种冲突通常以前者的胜利告终。

要使政府经济能力突破政治利益的桎梏，必须彻底变革破产立法的基本原则：用“淘汰无生存能力企业”原则取代“防止非意愿破产”原则。这种革命性变革只能在经济繁荣期实施。

后疫情时代，政府经济能力能否有效履行其核心职能——在国家 and 全球层面高效组织生产活动，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关于作者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经验。他是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Fellow（社会科学部）与科睿研究院学术委员，同时也是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帕帕瓦教授还担任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兼总秘书长。

帕帕瓦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应用经济学、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经济学。他创立了“死亡经济学”的概念，作为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逆经济学”理论，用以解释技术落后的经济现象。此外，他还建立了拉弗-凯恩斯综合模型，并制定了消除经济增长指标中的追赶效应的方法。



Vladimer Papava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Economist

✉

vladimer.papava@tsu.ge

FCAcad; Academician-Secretary, Georg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Full Professor of Economics, Ivane Javakishvili Tbilisi State University; Principal Research Fellow, Paata Gugushvil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enior Fellow, Rondeli Foundation

在政治生涯方面，帕帕瓦教授曾担任格鲁吉亚经济部长，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经验。他还曾担任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他的研究不仅关注理论创新，还致力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如全球化转型、大规模经济制裁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中高加索-亚洲地缘经济问题。



Reference List

Abbas, S., Pienkowski, A., Rogoff, K., eds. (2019). *Sovereign Debt: A Guide for Economists and Practition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hearne, A. G., Shinada, N. (2005). "Zombie Firms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in Jap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4): 363–381.

Ajili, W. (2020). "Pourquoi la crise COVID-19 est-elle aussi inédite?" *L'Economiste*, 1 mai,

往期推荐

- 中国科研：在国家战略与好奇心驱动间寻平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805&idx=1&sn=c5cac06e6860c48865b53f1cc6a1507f&scene=21#wechat_redirect)
- Cell 最新综述：衰老标志更新至 14 个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868&idx=1&sn=80b68479190f4402495d45a2c109813f&scene=21#wechat_redirect)
- 格陵兰：独立、博弈与大国角力下的生存困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776&idx=1&sn=a192e20a5a675030cddcdf4e5c6b0706&scene=21#wechat_redirect)
- AI 时代，我们为何更忙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791&idx=1&sn=031e118f432345d0f6dc5e5201ecf1bf&scene=21#wechat_redirect)



科学引领 睿智探索

求是客观 经世致用

Ke Rui Academy

关于我们

- > 科睿介绍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89)
- > 文章投稿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1)
- > 交流合作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2)
- > 新闻动态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69)
- > 成员申请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0)
- > 工作机会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70)

联系电话 00-852-66769804

联系邮箱 academy@kerui.org

